

## 论民族意识对沦陷区作家心态的影响

冯昊 史育婷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沦陷区作家处在敌占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与微妙的。他们在沦陷区的生活与创作中, 自觉与不自觉地普遍流露出远离政治的心态, 在文学写作中隐晦地表达民族意识, 以及有意无意地诉说以寻求心理的解脱的各种行状, 都表明民族意识对沦陷区作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民族意识; 沦陷区作家; 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民族意识是一种民族自觉, 也即民族的构成分子, 在主观上对同民族的人, 有彼此一体的心理感觉, 乃利害与共的精神意识, 蕴藏于内心又自别于其他民族。民族意识对民族成员身份的体认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存亡和发展具有道德义务和责任感的复杂感情。但如雷蒙·阿隆所言“任何政治制度都为那些擅长语言和思想的人提供了机会”, 当大量知名作家撤往内地之后, 沦陷区文坛一片空白。这给滞留在沦陷区的作家, 尤其是新进作家提供了可能的写作空间。此外, 日伪当局出于粉饰太平等多种考虑, 也给予了沦陷区作家从事创作的各种机会。然而, 当沦陷区作家拿起手中的笔时, 才知道自己要承担多少压力, 需要多大的勇气! 在民族危机的语境中, 作家与民族共同体天然地有着更多的联系: 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以传统道义的要求而言, 在黑暗时代, “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倾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套用王尔德描述自己的话来说, 杰出的知识分子总是与自己的时代具有象征的关系: 在公众意识中, 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 而这些都可用于持续不断的斗争或投入斗争的社群。”<sup>[1]</sup>因而, 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得不考虑到其身份角色的定位, 不能不考虑到其写作后所面临的道德的压力。这种压力之大, 我们可以从俞平伯在沦陷区生活时的心态中略见一斑。沦陷时期, 俞平伯坚守节操, 困守孤城, 却由于生活十分拮据, 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托人变卖家中的藏书与墨宝为生, 有时窘迫之急竟至“滋窘求售, 颇盼能脱手也”境地。后实无奈, 俞平伯不署名地为《文艺杂志》编审稿件, 他在

1943年底致周作人的信中, 认为接手编辑一事是“既屡承台命, 不敢固辞”, 同时他要求周作人“对外乞勿言及, 以为有熟人投稿, 去取之间颇有困难也”。其彷徨之态与戚戚之心溢于言表, 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如俞平伯者都担心世人对其如此行踪的指责而求“匿名”藏身, 何况那些为了生活抛头露面, 出没报刊杂志之中的作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sup>[2]</sup>可见, 在民族危机之中, 民族意识对作家强大的心理影响致使作家在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坚守与更复杂的心理。

沦陷区作家普遍流露出远离政治的心态。如《中国文学》杂志曾经举办过作家交换书简的栏目, 其中林榕《覆行田茂一书》一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 “然而这三四年来的生活, 绝不同于昔日, 我渐渐变成黑暗中的摸索者, 失掉了光明与理想, 我仿佛带领着身畔的人, 走着茫然若失的道路, 后面还受着无情的吆喝, 只有负重前进, 而没有停息的一日。”作者认为自己的生命消耗在平凡的琐事上, 而自己又不能不顾及明日的的生活。对于在沦陷区写作的人, 作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其实也是他对于沦陷区写作的一个态度。他还说: “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有一种‘至诚一贯’的态度, 不随着风向转移, 诚恳的而且热情的做着这件永久的艰巨的事业但是这种努力如果脱离开我们的时代, 那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相反的结果仅仅为政治的尾巴, 却更失掉对文学的尊敬。”<sup>[3]</sup>这种远离政治的姿态, 是迫于日伪当局的高压政策, 作家个人无力表达内心真实感受的一种生存策略, 更是作家民族意识影响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 远离沦陷当局的“政治”, 正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为: 06WX43)《沦陷区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 07JC751011)《租界体验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课题的研究成果。

8 收稿日期: 2008-09-07

一些作家出于对文学本身发展的考虑，同样希望写作能够不过多地受政治的影响。古丁就曾这样说过“理论呢，我不敢梦；因为倘有的话，该是官准的东西，有若无！总之，文人多少要守一些节操，也不妨犹自开拓一条各自的文学道。文学终非政治，涂成清一色的企图该会萎缩文坛的。”<sup>[1]</sup>不涉政治，致力于“文学”艺术本身，对于沦陷区依靠写作为生的作家实在是较为稳妥的方式。《光化》的主编离石就在创刊的《次发刊词》宣称“诚然在今日办刊物，确是‘不识时务’的人，况且我们的动机至为平凡，既不是为了要争取文坛正宗，亦无力热心宣传国策，更没有什么主义要运动，更没有什么思想要阐扬，一切大志宏愿都说不上，动人心闻的名词更没有，唯一的原因，还是在于要办与能办吧！”<sup>[2]</sup>可见办刊与写作都是为了“写作”本身，尽管不合时宜，然而因为无心宣传国策，倒是心安理得地办下去，写下去。持这种心态的作家与编者不在少数，同类的如《万岁》的编者就说过“万岁半月刊在这个时候出版，并没有什么崇高的志愿，远大的抱负，只不过想在这消沉的出版界中增添一些活气，给读者们在无可奈何的时代中多一份消闲解闷的刊物。”<sup>[3]</sup>考虑当时日伪政治宣传的强制与检查的严酷，这自然不难见出作家们的消极之姿态背后真实的抵抗心态。

同时，更有许多沦陷区作家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最大努力地在作品中隐晦地表达民族意识。这种利用一切机会表达民族意识的作品，也是沦陷区作家对于生存语境的一种精神反抗。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家心灵的窒息<sup>[4]</sup>，对此作家们以“文学自救”的心态来进行创作。一些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魔，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sup>[5]</sup>，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sup>[6]</sup>参加过哈尔滨文学运动、后来留在满洲保持沉默的山丁，为纪念萧军、萧红离哈4周年，就曾经写了回忆录《萧军与萧红》，发表在《新青年》上，呼吁继承他们的意志：“我们来踏着前人的脚步，把压死了的种子掀起来，再播下新的种子在这块土上。”<sup>[7]</sup>作者以战斗的诗句延续了抗日战士不屈的精神。这种潜行于字里行间的民族意识为沦陷区文学带来更高的品格。

异族肆虐的蹂躏、个人不幸的遭遇、生活的极端困苦、人格尊严的伤害，使得沦陷区作家更容易产生感伤

的情绪。师陀在沦陷时期也写有不少作品，但内容大部分都是“与抗战无关”。据他自己说：“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混过来活过来的……只是心怀亡国奴之忧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sup>[8]</sup>，其中所隐含的民族忧愤与个人忧郁之情已经融为一体了。如果整体观照沦陷区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其时消沉萎靡的创作氛围，各种期刊充斥着言情、感伤、自怜，甚至颓废的作品。在动荡时局中，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现实人生，沦陷区作家的作品反映出他们选择逃避现实，沉迷于个人小天地的创作格调，是无奈也是悲愤。我们应该看到，沦陷区文学中的感伤并非一种肤浅的伤感与痛苦，而是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人们因抗争无力与困于时势的多重忧伤，是一种时代忧郁症

的表征。

困于沦陷区的作家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民族气节与道德责任的压力是影响心态与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民族气节与道德责任的压力并不总是处于最显要的位置，现代文人的角色转换对沦陷区作家在选择生存方式及其心理状态也有重要的影响。文人不再依靠“皇粮”生活，“学而优则仕”价值体系的解体，使得文人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不似从前那么紧密，使其能够从传统“气节”中稍稍有所解脱。其次，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深层的民族意识会使大多数人投入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斗争中。但是，长期以来的贫困生活状态，大大削弱了伦理与道德的自律价值。加上“明清以来，气节与道德的基础就极为薄弱，既有传统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宽容与包融，虽然表面上处处讲道德、气节，而缺乏一种坚强的精神支柱。中国文化有一种对异族文化的宽容和包融，但有时也缺乏一种原则。汉奸在乡村、城市所面临的道德压力远远没有他们所获得的实利多。”<sup>[9]</sup>因而，沦陷区作家为生存而写作也是一种普遍心态，甚至有以此为由而沦为“帮凶”，汉奸之类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对于来自气节与道德方面的压力，沦陷区作家也作了某种思想上的调整，甚至寻找一些理由来求得心理上的解脱。山丁曾在一篇评论中论及作家秋莹的生活时说：“他本身就是一出悲剧，我知道他到现在还没有过着舒服的生活”，“《飘零》，也许是他的宿命，是一切满洲作家的宿命。为了争取一点口食，不能不飘零各处。为了争取一点口食，不能不搜索枯肠。到现在，他仍旧在为争取一点口食而写作。从他的作品里寻不到咬文嚼字的作家们的所谓的‘知性’是可以不必解释的。然而，他的执拗的求生的意识却强韧不拔地屹立在读者之前。他的‘暗淡的生活’、‘阴郁的思想’使每一个读者嗅到而感受了”。这段话真实地刻画出东北沦陷区一部分作家的困窘的生活，也道出了他们写作背后真实的推力。秋莹自己也说：“我没有一般文人那点可爱的清高，因为这些年命运的穷蹙、生活的拮据，在长年的失业里，我知道

没有钱怎样活不下去。我也知道了所谓清高是必须有了钱以后才能办到。”<sup>[3]</sup>艰难的生，对于沦陷区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勇气，一种在生存与思想之间抉择的勇气，一种说服自己“活”下去的勇气，也是沦陷区大部分作家无奈的选择。不少作家也真在贫困中死亡，如写有《兼差》这样优秀小说的作家高深，颇具才气就死于贫病之中。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顾明道最终也是靠读者和朋友的捐款得以最后的安息。沦陷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揭示贫困、苦难、饥饿、病患等主题，既是对沦陷黑暗统治的控诉，也是对生存合理性的一种诉求。他们所展示出的个人命运、逼近死亡边缘的生存窘迫多少也能够减轻他们在沦陷区写作的一些道德自责。

一些作家由于自觉没有涉及政治，写作以及其他活动都是出于生存考虑，因而内心并没有更多的困扰。如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苏青就宣称“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sup>[4]</sup>苏青在1941年上海沦陷后，开始卖文为生，曾主编过《天地》杂志文艺月刊，主持过上海天地出版社。她和汪伪政府的官员关系比较密切，但其写作文字倒比较干净，对于生活的执着以及写作本身单纯的看法使苏青对于在沦陷时期以写作谋生有着更“正当”的理由。她在《如何活下去》开头一句就是“我要活。如何活下去，正在设想着。”“无论是有钱的抑或无钱的，有力的抑或无力的，都不免于彷徨迷惑之境了。炸弹随时可以落到自己头上，时局随时可以起变化，什么东西、地方、什么人才能真正靠得住的呢？”“昨夜想想还是投笔回乡下吧，但是今天却接到家中来信说：金饰现钞统被匪军劫掠光了，租款又收不到，千万要我汇些钱去救急。”“然则——如何生活下去呢？我是只好希望‘船到桥门自会直’”。<sup>[5]</sup>这些话应该说贴近了一个在乱世艰难维持生计的女性作家的内心真实感受。苏青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与日伪政治人物亲近的压力，当年她在《古今》中发表的对陈公博肉麻的吹捧文章<sup>[6]</sup>就令她后悔不已，有论者就考证苏青在自己的选本中从不选用此文即是明证。苏青坦荡与隐晦的心理在她的言行之中不自觉地流露给世人明察，也实在令人感慨。

在长期的寂寞之中，精神的匮乏、视野的窄小以及经历的单纯使得一部分作家，特别是那些成熟于沦陷时期的青年作家有着更大的写作冲动。当沦陷区文坛这一特殊空间给予他们一个表演舞台时，他们对于写作有着更为微妙的心态。他们不甘于沦陷区文坛的冷寂，急于改变现状，个人对于生命的飞扬也有着一种难抑的渴望。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前面所说的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就带有这种心理。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文艺志派”，一个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也有着类似的心态。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

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sup>[7]</sup>古丁曾经对沦陷区文坛的未来有过一段激情式的论述，“满洲文学还没有脱离萌芽的时期，它的开花，无宁说要等待到将来。”<sup>[8]</sup>为了改变此种现状，他提出了“写印主义”。

其实就算这些作家给予自己更多写作的理由，他们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民族”之所在。如活跃在东北沦陷区的古丁，在一次晚宴上，在彩纸上挥毫：“今夕复何夕！我乃黄帝子！君仍大和裔！君爱大和子！我爱黄帝裔！”<sup>[9]</sup>这种危及安全的民族身份的自我表白，其实道出了其内心的隐忧。古丁原系北方左联组织部部长，被捕之后叛变。其后，在沦陷区生活时期，他一直对这段事实三缄其口，“变节行为”在其内心所造成的道德自我谴责应该是存在的。古丁在浅见渊来访问起如何看待萧军时回答说：“萧军才是真正的作家呢。他没饭吃的时候就靠写作来支撑。”他用激动的语气说，“决不像我过的这种双重生活。真正的作家，不管有没有饭吃，都该走萧军的路。”<sup>[10]</sup>对于古丁如此自责的言语，至少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一般的作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是为谋生而写作的，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另一层意思是他对自己不能坚持气节所进行的自责，内心受到了道德的谴责。他说这些话，即使是一种姿态，也可看出民族气节意识对个人心态影响是重要的，这也是沦陷区许多作家个人作为“主观的身份”表白的需要。这种自责的方式，显示出沦陷区作家内心对于民族气节这一价值确认的需求。

民族的痛苦与不幸总是与个体紧密相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前途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也决定着沦陷区作家的写作那种民族意识的流露是命定的色彩，它描绘出沦陷区作家的内心图景。沦陷区作家在艰难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负重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是其最值得赞叹的一面。而那些思想内容，多为远离政治、脱离现实的谈古忆往之作、风花雪月之谈、社会人情之绘，反映了沦陷区作家在残酷的屠杀、贫困的生活、欲望的诱惑等面前所呈现出矛盾、胆怯、回避、无奈与痛苦的心态。他们在绝望、悲观、感伤之中无奈地接受依靠写作谋取生存的事实，而这种写作中反映出来的对于个人前途、家庭的未来、声望、名誉的考虑，所谓的“坦然”、张惶、辩白、疏远的心态，其实都是在异族极端压抑下的心理扭曲表现。这也是他们当中不少作家今后生活永远的伤痕。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对那些“在占领的奴役下，在威胁的气氛中”，“写出具有持久性的作品”作家的勇气表示必要的尊重与敬佩。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所说，沦陷区作家对事物的时间与腐蚀的反抗是另一种基本的反抗。作家是反抗性人物，敌人的占领足以启示他们，同时，他们在反抗中，（下转 17 页）

界和人物内心纷繁的思绪和错综复杂的感情。作者面对“历史”和“现实”构成的这种无序的现实世界,利用符合逻辑的想像力和他独特的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叙述能力,将“不合理”变成“合理”的思辨能力,以此来强调和渲染人物意识的流动性和跳跃性,对“殖民历史”和“现世”秩序构成批判,力图真实地记录南非消除种族隔离这个特殊的历史变革带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上的改变和冲击,从而使一个个瞬间的生命感受、一个个叙事事件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质感,耐人寻味。

#### 结语

《耻》是一部从内容到寓意都具有丰富层次的作品,可以说:库切的笔调是震撼人心的,库切的思考是严肃的,库切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从这一悲曲的余韵中走出,读者会感到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入,这是因为库切作品中主题与创作手法的复调旋律引起了读者的沉思。他感受悲哀,又超越悲哀,以一种如同古希腊悲剧使人得到“宣泄”后的宁静心情作结,这正是库切这位“沉默”的文学大师异于常人之处。难怪诺奖评审团表示,“我们非常确信他的文学贡献的经久不衰的价

值。这并不是说他写书的数量,而是说他创作的多样性以及极高的品质”<sup>[8]</sup>。正是由于库切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既立足于本国肥沃的文学土壤,又模仿、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手法,真正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使这部作品成为后殖民文学的佳作之一。

#### 参考文献:

- [1][4]J.M.Coetzee,“The Novel Today”, in *Upstream*,Vol.6, No.1,1988,p.3,p.4.此处和以下引文均为笔者翻译。
- [2][5]引自张冲,郭整风译,耻.译林出版社,2002版。
- [3]转引自 Susan VanZanten Gallagher,*The Backward Glance: “History and the Novel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in *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3,1997,p.380.
- [6]Michael Mckeeon,*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 Baltimore:John Hopkins UP,1987,详见第三部分。
- [7][8]转引自《外国文学研究》No.1,2004 ,p.131.

作者简介:郭秀娟(1972—),女,汉族,甘肃河西学院英语系教师,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及英美文学。

(上接10页)存在着作家的自由。<sup>[21]</sup>

#### 参考文献:

- [1][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40.
- [2]孙玉蓉.出任伪职前后周作人为他人谋职轶事探究[J].鲁迅研究月刊,2004,(8):49.
- [3]林榕.覆行田茂一书[J].中国文学,第2号,第17页.
- [4][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75.
- [5]离石.次发刊词[J].光化,第1年,第1期,1944年10月,第1页.
- [6]编者.编者言[J].万岁,第1期,1943年1月,第73页.
- [7]爵青.《黄金的窄门》前后[J].青年文化,第23页,1943年11月号.
- [8]师陀.果园城记·序[M].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53.
- [9]师陀.无名氏·序言[M].师陀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10.
- [10]邓立(山丁).萧军与萧红[J].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1辑,1980年3月,54页.
- [11]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136.
- [12]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87.

- [13]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M].第203-208页.
- [14]苏青.自己的文章——代序[J].风雨谈,第6期,1943年10月,第11页.
- [15]苏青.如何活下去[J].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封面文章.
- [16]苏青.《古今》印象[J].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第54页.
- [17]徐道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30.
- [18]徐道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76.
- [19][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275.
- [20][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21.
- [21]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7.

作者简介:冯昊(1976—),男,江西都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育婷(1981—),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中西文学比较。